

非正规性
INFORMAL CITY
城市

龙元 王晖◎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非正规性城市

龙元 王晖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 京 ·

内 容 提 要

城市非正规性 (Urban Informality) 一直是国际学术界中的重点话题, 它旨在探讨非西方理性城市之外的第三世界城市状况。本书作为武汉市汉正街这一传统商业街区的个案研究成果, 集历史性、叙事性记述为一体, 从宏观与微观两层面展现高密度极限状况下的真实城市日常生活片段, 把握民间自发的城市实践及城市生成演变的机制和策略。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大众建筑和城市的欲望与意义, 思考中国城市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建筑学师生及城市管理者的阅读, 亦可供其他相关专业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正规性城市 / 龙元, 王晖编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641-2082-5

I. ①非… II. ①龙…②王… III. ①城市—生活—概况—武汉市②城市—发展—研究—武汉市
VI. ①D676.31②F299.27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6892号

非正规性城市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 汉

网 址: <http://press.seu.edu.cn>

电子邮箱: press@seu.edu.cn

责任编辑: 魏晓平

责任印制: 张文礼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10年3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2082-5

印 数: 1~2200册

定 价: 45.00元

本书为200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非正规性视野下的旧城空间演变模式探讨”（项目批准号507780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龙 元：日本名古屋大学建筑学博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建筑理论、市民参与与城市规划等

王 晖：香港L&O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博士，曾留学日本名古屋大学

吉田邦彦：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法和居住福祉法

汪 原：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哲学），研究方向为建筑和城市理论

卢 山：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2006年获美国亚洲文化协会黎锦超教授建筑教育奖资助前往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学校进行学术交流访问，现研究方向为建筑历史

陈 煊：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博士，曾留学英国Salford University，主攻城市公共政策及规划决策研究

王 刚：河北省唐山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华中科技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

马振华：山东同园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建筑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博士

夏 鹏：华中科技大学建筑设计理论与理论博士研究生，曾任职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目 录

1

绪论：非正规性城市思考

19

关于“汉正街”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思考

25

全球化时代“城市非正规性”（urban informality）的居住福祉法学考察

38

从日常生活视野看汉正街改造

48

城市更新过程中非正规建设的过程分析
——武汉汉正街的个案研究

66

汉正街图说——街巷篇

79

1911年前汉口城市非正规性的历史流变

92

汉正街：一个非正规性城市

103

汉正街宝庆住区调查日记

117

汉正街的街巷系统与街头生活

142

城市非正规性视野下的汉正街图景

158

武汉市汉正街形态学研究

164

汉正街自建居住建筑类型演变初探

186

后记

187

附

绪论：非正规性城市思考

龙 元

今天的城市研究中有一个矛盾：21 世纪的城市增长大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但是许多关于城市功能的理论却仍然源于发达国家。¹

——Ananya Roy, 2005

拉各斯（Lagos）不追随我们，我们却要追随拉各斯。²

——R. 库哈斯，2001

本书主要内容源于对武汉市老城区——汉正街地区的长期田野调查，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城市非正规性视野下的旧城空间演变模式探讨”的主要研究结果。虽然书中频繁地涉及“城市非正规性”（urban informality）这个概念，但所有的描述和结果远未达到理论的高度——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基本上，这是对一个非正规性城市的体验记录，其方法完全基于现象学的立场，通过叙事性（narrative）的记述，展现汉正街地区高密度极限状况下的真实生活片段与持续的民间城市实践，把握城市自发性成长演变的机制和策略，理解大众建筑和城市的欲望与意义，探索城市未来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相比传统上那种聚焦于空间资源、人口分配、城市结构、发展模型等的宏观城市规划，本研究重点是个体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可谓一种解析城市日常生活的微观城市论。微观城市论不以城市全体为考察对象，也不寻求观点的综合性，而是选择一个城市局部，如街区、邻里等微观区域进行深度分析，试图以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解构现代化的“铁律”，以小见大。汉正

街就是本研究的实验对象，实验方法则与 W. 本雅明对巴黎拱廊游荡者（flaneur）³ 的研究相类似。事实上，城市状况——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现象和经验而非精英们的城市理论教条，恰恰构成了城市认知、空间分析和理论思考的原点。

汉正街是武汉市硚口区内一条具有 500 余年历史的著名老商业街，与长江支流的汉水大致平行，呈东西方向展开。历史上此地曾“外江内湖，四面环水，故业能盛”⁴。在民国初年以前，“汉正街”顾名思义乃汉口之正街，也是汉口城市的起源。民国以后，汉口的城市空间随京广铁路的开通而从汉水向长江方向扩展，导致中心外移，汉正街与汉口的关系逐渐逆转。1950 年代中期，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几乎宣判了汉正街的死刑。1980 年代初期汉正街因锐意改革、大胆创新而再度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一度被誉为“天下第一街”“中国小商品经济的摇篮”。到今天，“汉正街”概念所指早已超出了一条线形街道的物理空间范畴，而覆盖了以这条老街为中心，携两侧繁华的商业带而构成的这片总面积约 1.69 平方公里的旧城区。另外，近年兴建的位于汉正街地区之外的硚口工业园也因汉正街的品

牌效应而被冠名为汉正街工业园，“汉正街”首次走出了汉正街。所以，今天的“汉正街”概念，是一条自然街道，一片旧城商业区及一座小商品批发市场，还是一个工业园，这种概念含义的多元化本身正是汉口城市的成长演变在空间上的历时性叠加。

汉正街一直延续着商业、居住、加工和行政管理并置的前工业化城市的混合功能结构，建筑上以高密度的自建低层住宅为主要类型之一，空间被高强度地使用，可谓东方城市“拥挤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⁵的代表。这里坊巷街衢，店面林立，商业繁华，寺庙庵观，会馆会所，茶楼酒肆，人口拥挤，摩肩接踵。历经500余年的繁华历程，汉正街至今还是这样一座鲜活的生活剧场，既上演着老城社会的市井百态，又书写着“码头城市”的现代传奇故事——“格网道路系统+高层建筑”模式的暴力推进，引发一场巨大的文化变异和历史断裂，古老的城市肌理上镶嵌着扭曲的新城图像。

站在现代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立场上，作为“城中城”的汉正街，既是一个城市又不是一个城市：这里看不到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心，不存在现代主义的城市功能分区和全体性格，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模糊，缺乏有效而连续统一的市政管理政策。无疑，它是一个充满问题和危机的地方，一个现代城市美丽身体上的毒瘤，一处城市的负遗产，理应被控制，被改造，被吞并，被清除。事实上近20年来，汉正街已经遭遇了几轮旧城改造的席卷，只是结出的“硕果”并不令人满意；住宅和公共设施得到一定程度的更新，但城市

活力、社区组织的力量、历史传统被摧毁。这再次应验了简·雅各布斯那著名的警示：“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依照规划理论，恰恰是那些不该衰败的地区在走向衰败。同样重要却不太被注意到的是，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按照规划理论，那些该衰败的地区却拒绝走向衰败”⁶。

但是，历史上汉正街却是以细胞增殖的方式成长起来，内外渗透，公私混杂，新旧并存。取代明晰、整体性的是多义性、流动性、临时性和“孔洞性”（porosity）⁷。汉正街不是理性和权力规划的结果，而是自然生成和持续演变的现实。汉正街也许不美，但它真实、积极、开放，紊乱但生命力旺盛。这里的关键词是混乱、冲突、疯狂、活力……一幅“拼贴城市”的浮世绘，一处超现实的梦境，一个无法为西方现代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原理和常识所解释的怪物，一处日常生活文化遗产。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城市就是凝固的政治。空间是社会的空间，独特的空间特质背后一定存在着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生态甚至精神意义。长期以来的流动人口和民间社团等的地方自治，培育了汉正街的包容性和参与性，而民间力量的强大正是汉正街的活力源泉。在这个市民化的城区中，外来人口比例一直高达80%。离乡背井的农民可以在此安营扎寨，谋生长成；社会的失败者、失意者、隐退者也可安然退守于此，这里不会让其沉沦，他们用乐观与勤奋挖出第一桶金后，重新起航，留下一条立足汉正街，走出汉正街，回归汉正街的清晰轨迹。而连绵500余年（除去政治因素带来的短暂停滞之外）的繁华岁月已经刻写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

路。透过其混乱、疯狂的表象，看到背后的理性选择的精明、人性的温存和一种内化的自我适应力与调节机制的存在。

“武汉是全国最大的集镇”，“武汉是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这类广为流传的社会调侃，歪打正着地反映出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逻辑的混乱，深层中则验证了关于城市文化与乡村传统混杂的“中国城乡连续体(continuum)”⁸的历史想象及评价。汉正街似乎为这调侃增加了最客观、最合理、最有力的支撑，因为它就是这大集镇的中心与缩影，是武汉地域性码头文化的空间载体和符号标签，兼具功能性和象征性，是市民每天生活的日常城市。其实集镇也并非完全负面的想象，集镇不等于混乱，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光芒似乎更垂青大城市，而这种垂青往往也构成城市难以承受之重。人们在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和效率的同时，无可奈何地吞咽下种种恶果：人地平衡打破，交通阻塞，空气和环境污染，人口密集，犯罪频发，社区瓦解，城市贫困，社会公正性丧失……所以，谁能轻易断言集镇必劣于城市？“农”尚且可以与现代城市共生，集镇为何不能与城市并存？表面混乱的汉正街也许蕴藏着某种城市的未来模式。

30年前的那场回光返照过后，汉正街还是无法摆脱暗淡和沉寂的命运。昨天的汉正街与武汉同构，是武汉的“原风景”。今天的汉正街却成为武汉的“他者”。在这种剧烈的角色变幻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价值转换和城市关照？在现代理性统治下的功能主义城市越来越成为普世主流的时候，对汉正街进行价值层面的追问具有超越一般想象的标本价值。

依照 A. 罗西的观点，类型是建筑和城市的本质存在⁹。所以，对汉正街城市空间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学的角度，街巷和住宅是汉正街的两个基本空间要素。街巷作为具体的地点，可能较诸任何其他城市设施和空间要素，对中国城市的空间、社会观念、市民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是城市现代性中最具实用性和想象性的空间，也是低层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住宅则是城市的背景，是形成街巷空间的主要要素，特别是自建住宅的类型学研究能够揭示出非正规城市空间演变的规则和模式。两者由公到私，构成汉正街城市实践的主要发生场所，可以由此看清汉正街的生活方式、汉正街的人和汉正街的社会。

1. 非正规性 (Informality) 与正规性 (Formality)

“非正规性”是一个含义丰富而模糊的动态概念，经常出现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文献中。作为正规性的对立面，非正规性一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非官方的、非仪式性的、不合规则的、随意的、新的等等。

在社会学意义上，非正规性泛指一种私下的、随意的、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形式，是一种个体化的社会控制模式和社会组织或压力类型。根据社会一般常识，非正规性行为被视为不遵守任何规则与程序，不服从任何组织化的命令，经常成为混乱、落后乃至低劣的同义词。与此相反，正规性则发挥着保护社会秩序、维持合理距离、稳定权力结构的功能，它处在社会中心地位，代表着正统的、合理的存在，享有主流文化的优越性¹⁰。

但是，正规性并不天然地具备道德上的正确性。相反，正规性包含着强制性逻辑，强调社会交往的非个人化侧面，突出程序的普遍性和官方的、合法的规则，容易导致官僚体制的肥大化，将资本主义关系嵌入到日常生活的深层，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及各种私人范畴被监察与操控，独裁和专制横行，人类行为的个性与多样性被削减，被规训，被压制。于是，私人利益也因失去了非正规性的保护层造成民间活力丧失，社区自发的控制与协调机能瓦解，多姿多彩的社会差异性被掩盖。如此非正规性被妖魔化，被正规性的逻辑所覆盖的结果，借用哈贝马斯的话，即“社会生活被殖民地化”¹¹。

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因为具有日常性的共识与个体行为选择扩大的功能，非正规性同样也是增加控制、强化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是一种自下而上、在自由旗帜下的社会（空间）组织逻辑。

在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两者的关系上，普遍存在着二元论的教条：

正规性—第一世界，非正规性—第三世界；

正规性—宏观，非正规性—微观；

正规性—理性，非正规性—感性；

正规性—社会，团体，非正规性—个人；

正规性—富人，非正规性—穷人；

正规性—公共，非正规性—私密；

正规性—被动的实施，非正规性—主动的创造；

正规性—规划的建设，非正规性—非规划的自建；

正规性—模式，非正规性—问题；

……

事实上，这类二元论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它将人们的视线导向两个极端点，强化分离，忽视了两点之间异常丰富的联系和连续的变化范畴和流动状态，忽视了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两者相互对立、相互缠绕、相互依靠、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动态过程。“在每一个正规系统的背后同时赋予正规系统以生命的都是一个或几个非正规系统”¹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认为正规性并不是非正规性的对立，而只是它的附属。因此，与其说是去划分正规性与非正规性的界限，不如关注非正规性的内部自身差异——不同的非正规性。

非正规性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受到多重力量的作用：比如传统的惯性、法律的权威、资本的逻辑和城市开发或管制政策（或它的缺失）等等。一般而言，非正规性产生于自由市场模式与城市现实条件之间的不匹配，或者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匹配。就中国的情况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过渡是孕育非正规性的最直接的温床。值得注意的是，政策的遗漏和政策的强化都容易导致非正规性的出现，如南非和以色列的种族政策和中国的户籍政策等，它们均直接主导了非正规性的出现。因此，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两者矛盾的协调更多地依赖于对正规系统进行调整。

非正规性虽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它存在很大的风险和危险性，常常与封建色彩、残酷的剥削、贿赂、童工使用、妇女歧视、不安全甚至恐怖活动等相联系。但是，非正规性不等于无组织化和无政府主义，不同于异端邪说，也不必然与贫穷落后和混乱无序

相连接。

2. 现代性 (Modernity), 理性, 进化论理性主义

总体上看, 20 世纪是一个逐步走向正规性的世纪, 它基于经济同质化和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假定, 在“现代性”理念下将社会关系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进行的正规性编辑。其结果导致资本主义关系深嵌日常生活深层, 把闲暇、信仰、家庭关系各种“私人”范畴通过商品化手段纳入其庞大的监察操控之内, 使社会关系全面依附经济系统。传统上那种面对面交往的非正规性逐渐为非个人化的官僚体制及其货币制度所取代, 工具理性、可确定性、标准化、正式的规则和规范成为现代生活的结构与信仰, 现代性成为正规性的同义词, 非正规性似乎与现代性、资本主义不可共存。

虽然这种正规化过程的趋势在现代社会中似乎不可逆转, 但仍然不应忽视一个客观现实: 正规性因为固守僵化的正规原则而剥夺了参与者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交往责任和利益, 导致彼此信任和相互理解的危机; 相反, 非正规性深深扎根于地域社会而成为培育社会信任关系、建构合作网络与创新手段的一个必备要素。特别是在面对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多变性与扩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那些正规性的、僵硬的、非个人化的规则逐渐成了无效的陈规陋习而成为变革的阻碍, 而非正规性的、个人化的价值凸显, 灵活多样的应对尤其重要。

最早对现代性进行反省的社会思想家是马可斯·韦伯 (Max Weber) 和格里奥格·西美尔 (Georg Simmel), 虽然观察的视角和使用的术语不同, 但是两人都体

察到现代性和社会生活之间的深刻矛盾, 转而关注那些微观的社会生活, 注重更为个人化的、面对面的交往形式。

韦伯认为现代主义的典型结构特征是“理性化”和“情感控制过程”——一个把个人自由装入 (工具理性的) “铁笼”中的过程。为此, 他呼唤一种新的个人主义的出现, 用“铁笼”的引喻激烈地抨击那种将人类行为加以正规控制的科层制度及其思想。在他看来, 影响社会集体交往的重要因素不是利润而是交往模式, 特别是体制和正规系统之外的交往形式, 即非正规的形式。

和韦伯一样, 西美尔也坚决地捍卫着生活的自发性以抗衡理性的官僚主义规制。他从货币经济的影响入手, 将关注焦点放在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特征和人的精神结构的诊断与分析上。“城市人的精神生活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是理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是货币占支配地位, 而货币本身也是一种非常理性的东西”¹³。他发现当理性主义对人的内在精神空间进行统治时, 货币经济则完成对外在生活空间的占领。在这种交互作用下, 现代人的情感体验被取代, 剩下的是无奈的、被动的适应与麻木, 成为“异化”的社会个体与“同化”的社会大众。

西美尔将社会定义为个体之间的交往, 视非正规的交往行为为人类行为中最根本、最普通的形式。他乐观地认为虽然现代社会具有总体上的碎片化、非个人化倾向, 但仍然应该可以享受到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

20 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始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

(F.A.Hayek) 穷其毕生精力关注理性、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类的交往原则，包括道德、资本主义原则，是先于理性自发形成的，因此理性设计、重构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或者经济过程都是超越个人理解力的高度复杂的存在，对此加以理性的严格规划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哈耶克区别了“进化论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nalism)和“建构论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两类理性主义及其不同的秩序规则，即自生自发秩序或内在秩序规则与组织的(设计的)或外在的秩序规则¹²。建构论理性主义信奉理性万能，坚持用理性的规划去掌控人类社会的未来，强调通过命令与服从并采取集中的统一行动达成组织的秩序。因此，建构论理性主义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其结果常常是理性规划被滥用、被神圣化，官僚主义和官僚组织横行，个人价值被否定，个人行为自由被压制，最终导致全能理性和国家至上主义的破灭。用哈耶克的话说，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企图，无论是出于如何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

取而代之，哈耶克从“有限理性”思想出发，强调理性的边界和限度，积极倡导进化论理性主义。在他看来，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大量理性不及的领域，历经数代人的实验与尝试而达成的传统和成就远远超越任何人为的理性规划或设计结果。换句话说，自生自发秩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经由不断的自我调整、不断试错而培育出具有回避混乱保持秩序和复杂性的一种内发力量和自组织性机制。所以，它是

适应性进化的产物，是渐进性的。同样，外部规则尽管是人类社会所不能缺少的治理工具，但是它却不能因此而侵扰或替代内部规则。“那种因现代社会已变得如此复杂而主张我们必须刻意规划现代社会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不争的事实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持如此复杂的秩序，所凭靠的并不是操纵或控制社会成员的方法，而只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亦即对那些有助于型构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予以实施和改进的方式”¹⁴。对哈耶克而言，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那些只要得到遵循便会导向自生自发秩序的规则，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对社会理论最伟大的贡献。

现代的文化倡导人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而正是这种控制思想却导致我们对环境失去了控制。现代性乌托邦也终于走下神坛，理性的暴力开始被反省和批判。“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正是因为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¹⁵。

在变化、多元的当今社会中，旧有的等级层次逐渐消解，个人主义的抬头，规制的缓和成为普遍需求和期望。人们终于认识到非正规性交往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摆脱那些正规的结构，维持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交往关系的良好平衡，才能真正取得社会的信任、合作和进步，促进社会融合，提高生活质量。

3. 非正规部门与非正规经济

城市非正规性的研究起始于1970年代。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肯尼亚报告(1972)中，基于肯尼亚城市就业状况的大规模调查，提出城市就业人口的大部分

不是在正规现代部门,而是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工作穷人”(working poor)——流动小摊贩、鞋匠、街头艺人、修补匠、垃圾捡拾者、理发师、搬运工……甚至还包括乞丐、妓女、吸毒者等。其后,经济学家 Keith Hart 首次使用了“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概念来描述这些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工¹⁶。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活动和交易模式,非正规部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具有门槛较低、变化灵活以及有内发活力等正面价值;另一方面,高劳动强度、低劳动报酬、危害健康安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无社会保障等(特别是对妇女、儿童)也是不可忽略的负面因素。后来,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事实,国际劳工组织改用更宽阔的“非正规经济”这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人员也纳入其中¹⁷。

从1980年代开始,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中对农业土地的非法占用已成为非正规的城市发展的主要形式。1990年代中期,全球范围内第三世界国家中约40%的城市人口(2.3亿)在从事非正规性部门的工作,其中绝大部分也就生活在非正规性环境(informal settlements)当中¹⁸。联合国2002年的报告也显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值的1/3到1/2都是来自非正规性部门¹⁹。所以,非正规部门已经成为与正规性部门相平行的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存在。

4. 非正规性城市(Informal City)/城市非正规性(Urban Informality)

1970年代关于非正规部门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劳动以及经济领域,而没

有直接地关注城市空间及城市生活形态。但是,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经济必然会投影于城市物理空间上,城市中“贫民窟”、“自建住区”和“自建住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第三世界城市被认为分裂成‘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个深刻关联的部分。在正规的城市中居住着的是政府、银行、办公大楼、学校、医院、高级餐厅,警察……但是除此以外就是非正规性的统治地盘:没有或少有警察,没有或少有政府,没有或少有可以辨认的秩序……”²⁰

全球范围内看,1990年代以前,非正规性城市一般是指第三世界城市中(特别是城市边缘)那些环境质量低劣的贫民窟或拥挤混乱的违法自建住宅建筑等,城市更新和再开发的政策多集中在物理环境规模的控制和空间形象的整治上。这种单纯的美学介入在现实中捉襟见肘,社会隔离与分层化、社会冲突、城市的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平等等方面困境频现。1990年代以后,非正规性已不再被视为一种通过自建而改善居住环境的简单手段或结果,人们开始树立起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非正规性城市的正面意义也不断为人们所关注:非正规性城市具有独特的城市肌理和社会空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存在的状态,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与可持续发展性。换句话说,非正规性已从被改造的对象演化为一种发展路径,它“不仅仅指穷人或特定的劳动阶层或边缘人群的活动,它是一个在自由主义范式下的组织逻辑”²¹。

美国城市历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认为城市有两类,第一类是经过规划、设计,或者说经“创造”而成的城市,这种城市在某个片刻被决定

下来，其结构模式由某个主导的权力一次性确立，其形式是几何性的。另一类是所谓的随机城市，也称作“生长而成的”、“随机发生的”、“自生的”城市。通常认为这类城市是在没有人为设计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们不受任何总体规划的制约，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土地与地形的条件，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下逐步产生和形成的，其形式往往是非几何性的。他还特别提醒，“由于众多的原因，这种旨在简化我们对城市形式认识的简洁的两分法对我们的阻碍实际多于对我们的帮助”，因为城市是复杂的，经过规划的城市所体现的规则性是有条件的，完全理性和彻底控制不过是一种幻想；而未经规划的城市的不规则性也只是相对的，它是一种仔细的推敲与刻意的非几何的设计和规划而成的有机，其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秩序与隐含的规则。“只要我们能够承认“有机”是一种持久的思想原则，也是一种古老的设计思想体系，那么我们便可以放心地去谈论所谓的“未规划”的城市——而不再抱有任何可疑的想要用“规划”的手段纠正它们的念头”²²。

科斯托夫明智之处正在于他对两分法保持着清醒的警惕。本研究，正规性（formal）城市和非正规性（informal）城市概念延续了与科斯托夫同样的思考。

城市的正规性一般被正式的法律文件明确界定的符号系统所描述、规定和表征，诸如城市规划法、城市总体规划、法定图则、建筑规范、城市景观条例等等，这些都是正规性城市空间的构成原则与基础，它的实施和实现往往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强权。可以认为，人通过理性而彻底控

制环境是整个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奠基石，城市规划概念本身也具有浓厚的理性及计划经济色彩。

城市的非正规性或者非正规的城市则属于那些规划条例之外的民间自发建设，是自然生成的（emergent）。但是，非正规性不等于非理性和没有规矩，它也在一定的控制原则和组织逻辑，它们不由明确的理性条文所界定，更多地隐藏在城市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无意识之中，以民俗传统、风水理论、神话、故事及生活经验等多种形式自然地存在于城市之中。

没有人为的控制，一定会有自然的控制。问题在于人为的控制是否必然优于自然的控制？

城市非正规性有着多重意义。在空间意义上，它通常可以从城市和建筑两个层次上去理解。在城市层次上指土地占有或土地利用的非法性，以及空间构成原则的缺失与矛盾而招致城市景观的无序性；在建筑层次上指贫民和移民（农民）利用一些随处可得的废弃材料自发搭建的临时性住房。这两个层次实际上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

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参照芝加哥学派沃斯（Louis Wirth）的观点，城市非正规性表示城市贫困阶层基于其自身利益和需求而维持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城市状态和城市实践，它体现出城市构成逻辑和自组织的城市化过程，代表一种新的城市文化。

关于城市非正规性现象的讨论，一直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争执，经常以“危机说”和“经济英雄主义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前者以正统的城市规划权威为代表，

如英国的 Peter Hall 对第三世界非正规的城市爆炸和城市蔓延表示出巨大的担忧，他特别警示，这种非正规性已经从第三世界侵入发达国家城市中。他用“危机”一词去描述这个现象，暗示着国家政府在消除非正规性方面所面临的巨大责任和挑战¹⁷。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以秘鲁经济学家 Hernando de Soto 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在其代表作《资本的神话》(The Mystery of Capital) 中，Soto 提出穷人在经济上是进取的，是自由市场导向的，因此具有英雄主义的独创性和企业家精神，是城市发展中的积极力量。同样在 1989 年出版的另一著作《另一条路》(The Other Path) 中，他认为非正规经济是国家和政府在满足人民的基本要求无能为力时由社会底层的穷人所被迫采取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措施，是导致经济最优化的市场机制的作用。

作为正式社会（理性）制度的必要补充，城市的非正规性是基于居住者的生活需求和未来希望而引发的城市变化，具有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和自我组织性，是适应进化的产物，因而具有可持续性。虽然非正规性的生成过程尚未被完全解明，但它不同于城市的混乱无序，非正规性概念本身也并不包含好坏的判断。事实上，它不是一种新的分析概念、建筑类型或空间现象，也不是一个新的城市化过程，而是城市久远的存在。正规性从来也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完全取代非正规性的存在。城市的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二者相互之间因时因地相互转化，界限模糊。在对城市进行彻底控制的欲望破灭之后，规划更有必要与那些不断涌现

的非正规的变化之间维持平衡。

5. 正规性城市与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非正规性城市中普遍存在着大量临时性的、自发建设的城市住区，在拉美被称 barrios, favelas, 英语中常用 shelter, squatter, slum, shanty town 等，通俗的称谓就是“贫民窟”，在欧美则是指无家可归者的占据点。这类居住环境具有一些共性：非法占地，布局零乱，缺乏道路、水电和卫生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公共空间不足，建筑密集，建筑材料多半也是“捡来”的废弃物，采光通风等物理环境十分恶劣，威胁人的安全与健康。另外，因为贫民窟的建设用地尚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所以在城市地图上经常没有留下任何标记，取而代之的是空白地块或城市绿地。

荷兰住宅研究所的 Paul Baross 指出，现代欧洲居住社区的形成过程为 PSBO (planning 城市规划方案决定→service 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building 住房的建设→occupancy 入居并开始生活) 模式，而第三世界城市（尤其是城市贫困层）的住宅区形成过程则为相反的 OBSP (即：占领·生活→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要求、供给→规划的对应与调整，而很多地方只有 OB 或 OBS, P——规划至今不存在) 模式²³。所以，欧美城市规划的常识无法处理第三世界的住宅问题。居住问题是城市化模式的缩影。由于规划政策和城市管制的缺位，以及受世界范围内经济自由化趋势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具有共同的自发性，“非正规性城市”（或“城市非正规性”）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两极化城市

化过程的一个普遍特征。

实际上,非正规性城市始于百年以前现代城市开始成形时,工业革命的推进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对城市土地的贪掠掠夺,失地农民被迫涌入城市寻求住房和工作。但是,此时人口的增长超过城市政府所能提供的住房、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界限,居民便以自建的方式缓解住房压力,贫民窟自然就是他们进入城市的首个据点,成为“现代性的黑暗背面”。虽然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压制,社会上被贬低,文化上被排斥,但凭着坚忍的耐力、顽强的适应性和非凡的创造力,他们成为非正规城市的主力军。

二战后到1960年代中期,战后的快速城市化导致大量自乡村涌入城市的移民和城市用地的快速增长,而移民自建区的增长率更是该比率的两倍。这些来自农村的城市新移民常常被视为现有社会结构的负担并潜在地危及现存的城市社会、政治关系。规划师和政府官员普遍对此持负面态度,他们画定城市人口增长的警戒线,主张清除自建区,用象征现代化的多层、高层住宅取而代之。

到了1970年代,通过对前期的建设进行反省,不少学者逐步认识到自建住区的积极意义。特纳(F.C. Turner)、鲁道夫斯基(B. Rudofsky)、拉波波(A. Rapoport)等对世界上那些广泛存在并且没有建筑师参与的自建以及乡土(本土)的建筑和聚落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非正规性城市和自建住房开始进入世人及学者的关注视野。特纳提出了“自助策略”(self-help approach)的想法,即政府帮助穷人们获取建筑材料,保证土地使用期的稳定

性,穷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建自己解决住房问题。这样,穷人将变成房主,拥有资本和持续性提高生活条件的保障²⁴。这种想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许多国际中介组织,如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发展机构(U.S.AID),开始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类住房更新项目,如著名的“地皮+管网”计划(Sites and Services Programs)、“更新”项目(Upgrading Project)等,旨在帮助穷人解决住房问题。

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十年,着力点集中在“地皮+管网”的提供、棚户区升级和其他项目的应用与分析上,并且继续得到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界发展组织的资助。“地皮+管网”的概念得到广泛肯定并被视为解决居住问题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但是,世界银行资助的许多项目都不能称作完全成功,因为出于降低成本的想法,居民被动迁到远离市中心、远离工作场地的地方,一些居民为了工作而不得不转租或变卖了他们的住房,重返原来的驻地。另外,此类项目吸引着相对来说经济条件较好的穷人,最穷的人因为没有固定职业与收入,无法定期还贷而难以享受这种好处。

从19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人口倍增要求城市用地面积扩大,对农业土地的非法占用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手段。与欧美的城市化历程不同,第三世界高速城市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是人口的不断增长与就业机会的增加不成比例,城市非正规性成为必然,非正规部门已经成为与正规性部门相平行的社会经济存在。

今天,非正规性已经是一个因时因